

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100周年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
2010

文物出版社



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100周年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

2010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刘 昶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张道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 2010/中国考古学会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010 - 3290 - 7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考古学—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0698 号

**中国考古学会
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
2010**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市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16 开 印张: 20.25

ISBN 978 - 7 - 5010 - 3290 - 7 定价: 125.00 元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论文集》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宿 白

主 任:张忠培

副 主 任:王 巍 童明康 赵 辉

编 委:王 巍 乔 梁 孙新民 李 季 李水城

李伯谦 张忠培 陈 雍 陈星灿 赵 辉

郭大顺 徐光冀 袁家荣 曹锦炎 童明康

董 琦 焦南峰

主 编:王 巍

副 主 编:陈星灿

执行主编:朱乃诚

前言

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的内容有三项：一是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二是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三是纪念夏鼐先生诞辰 100 周年。

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工作的主要组织者、指导者和重要的奠基人，也是中国考古学会重要创始人，是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长。51 年前的 12 月 26 日，夏鼐先生在“长办”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发表了《长江流域考古问题》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的指导下，当年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使三峡考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构建了本次开展三峡考古的学术平台。今天重读夏鼐先生这篇讲话，仍然倍感亲切。我认为这是一篇高瞻远瞩的讲话，同时，也认为这篇讲话是评估此次三峡地区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视角。我们应当怎样纪念夏鼐先生诞辰 100 周年呢？我在《学习夏鼐先生 继续拓展中国考古学之路》这篇文章的结尾写过这样一段话：“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国自上世纪 20 年代引进西方考古学之后，经李济、裴文中、梁思永、尹达、苏秉琦和夏鼐诸前辈的奋斗，至 1949 年，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考古学自己之路。1950 年以来，又经裴文中、梁思永、尹达、夏鼐、苏秉琦、贾兰坡和宿白诸先生的努力，将这条路拓宽了，延长了。我们要继承夏鼐先生的务实学风，学习他勇于开风气的精神，沿着前辈已经走出的这条路走下去。我认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扫除传统的教条和新进口的洋教条，才能将这条中国考古学之路继续拓宽，继续延长，使之成为更加康庄的大道。”学习夏鼐先生，继续拓展中国考古学之路，这就是我们对夏鼐先生最诚挚的纪念。

本次年会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巍副理事长受第五届常务理事会委托，代表常务理事会，提请本次理事会审议他作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和理事会讨论学会今后几年的工作并作出相关的决定。

本次年会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根据学会秘书处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统计，参加这次年会的学者共提交论文 60 余篇，这些论文除多数围

绕会议主题外，还有部分会议主题之外的论文。中国考古学会历次年会，除设置会议主题外，也容纳主题之外的论文，按惯例，我们欢迎这些年会主题之外的论文参与本次年会的学术讨论。

将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作为主题列入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进行专门研讨，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会举办年会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也是自三峡地区考古进行以来召开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的内涵与规模，在中国是史无前例，于世界也是绝无仅有。同时，在中国历史文化区系板块结构中，三峡地区是不可或缺的一重要板块，其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具有自身特色，也相当重要。三峡地区文物，类型广、数量多、规模大。在保护工作中，我们在广泛、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依文物价值，首先将其分为非典型的不具代表性和典型的具代表性的两类。对非典型的不具代表性的地面文物，采取测量、绘图、照像、文字记录及提取标本保护；对非典型的不具代表性的仍有一定重要性的地下遗存，则采取封土夯实原地保护。对典型的具代表性的地面文物，一般采用搬迁移地保护，个别的实行原地的工程保护；对典型的具代表性的地下遗存，则采取考古发掘进行保护。同时，对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具有保存价值且十分珍贵的地下遗存，有的则切割提取出来移植于博物馆，进行保护、保存和展示。在难以如此保护保存的情况下，则在原地实行封土夯实，以求长久地保护。如是对文物保护之慎之又慎，以及管理之强，布控严密、详细调查基础之上之精心规划、付之于实践时所作动员之广泛、组织之系统、实施规划之认真，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历经之久，以及参与文物保护的学科之多、之精、之尖，在中国史无前例，于世界也是破天荒之壮举。

全国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披星戴月，摧荆斩棘，历经千辛万苦，踏实创新，务实求真，团结拼搏，终于取得一系列成绩：抢救了中堡岛、大溪、哨棚嘴、旧县坪、明月坝等一大批珍贵的地下文化遗产；保护了屈原祠、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等一大批特色鲜明的地面建筑；积累了文字、测绘、影像等一大批科学、完整的原始记录资料；收集了一大批历史悠久、类型多样的珍贵文物；出版了《秭归庙坪》、《巴东楠木园》等一大批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开创了盐业考古和石器制造场等一批新的研究课题；基本廓清了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使我们对三峡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之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了整体的改观。

目前看来，三峡地区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画卷已经基本清晰而较为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里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丰富，形成系列，自具特色，是研究早期人类及其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内涵复杂，瞿塘峡以东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

框架在原有基础上得到系统的深化和完善，而瞿塘峡以西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填补了考古学文化的诸多空白，其新石器时代文化总体呈现出的长江中游文化区与四川盆地文化区在该地区发展、碰撞的运动轨迹，也较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里的夏商周时期遗存特色鲜明，为破解巴人之谜、探讨巴蜀关系与巴楚关系提供了广阔空间；秦汉一统，这里的文化遗存在与周边地区趋同发展的同时，仍然保留浓郁的峡江特色。明月坝、旧县坪等一大批唐宋时期县城、集镇的大规模发掘，在开创三峡地区城镇考古工作先河的同时，为研究区域城镇发展史及城镇建筑艺术积累了宝贵资料。我们将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作为本次年会的主题，目的就是要及时总结已经取得的文物保护成果，进一步促进三峡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扩展和深化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已经建成，我的心情相当复杂，简而言之，主要是“惋惜”、“宽慰”四个字。为何惋惜，是基于工程的性质逼使我们对于三峡地区文物的保护，只能在当代认识的时代局限下去确认文物的价值（以决定保什么，不保什么）和文物的等级；只能在当代文物保护手段的时代局限下，去从事面临一次性破坏下的最终的一次性的文物保护。这样，不管我们作怎样的努力，三峡地区的文物都逃脱不了基于这认识和保护手段的时代局限下所遭遇的损失。“高峡出平湖”，我祈望茫茫一片汪洋淹没下的文物尚能安然无恙。宽慰，是回归现实后所产生的价值评判，也是一种情感。所以宽慰，是因为我们虽然受时代局限性所制约，却达到了这时代允许的最大极限，去作了这时代力所能及，甚或突破这时代的局限性去作了这时代力所不及的事情，使相当部分的三峡地区古代文化遗产没有随着江水的上升而淹没，并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

宽慰之余，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三峡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刚从田野考古战场奔波归来的朋友，尽管大家依然蓬头垢面，身心仍处在疲劳之中，我还得请你们坐下来冷静地深思：我们在田野考古中所积累的文字、测绘、影像及实物资料，是否已妥善归档，并作了妥善的保存、保护？是否具备了向同行开放研究的条件？室内整理是否已经开始？进行得怎样？报告是否已经写出来？是否已经出版？这些工作没有完成，三峡文物的保护工作不能说胜利结束。进而，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讲，则有更长的路要走，还有大量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积累的大量田野考古资料还需要长时间消化。我们相信，已经获得的三峡古代文化遗存是一座巨大的宝库，必然会产生大量新的学术课题，需要开展多层次和同一层面的多角度的综合研究，逐步揭开其神秘面纱，走向历史的真实。

至于我们这次举办的三峡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对以往来说，我们谋求的虽是一个学术成果的汇集，但从未来三峡地区的考古研究来看，只能说是一个剧的

序幕。让我们从这次会议开始，除继续挑起保护传统文化这副重担外，还将把传统文化转化为文化传统这副重担担当起来，谱写三峡地区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的新篇章，为揭示文物所承载的历史及文化和为当代的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三次年会暨纪念夏鼐先生诞辰 100 周年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目 录

前言	张忠培(1)
关于配合长江三峡水库考古工作情况的汇报	石兴邦(1)
三峡考古的回顾与启示	乔 梁(7)
三峡湖北库区的主要考古收获	王凤竹(24)
文化变迁与文化传统	
——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孟华平(29)
三峡库区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及其编年	李水城(38)
试论玉溪上层文化	白九江 邹后曦(53)
关于哨棚嘴文化的几个问题	江章华(73)
大溪文化彩陶溯源	王仁湘(89)
大溪文化玉器研究	院文清(109)
长江三峡地区远古时期家畜饲养	杨 华(120)
三峡地区动物考古学研究检视	罗运兵(132)
三峡地区的早期楚文化研究	张昌平(142)
秭归庙坪及巫山双堰塘陶鬲的年代和文化属性	黄凤春(155)
鄂西南地区西周“鬲”类遗存与楚文化的关系	王 然 邓启江(164)
鄂西地区两汉墓葬的文化因素分析及文化发展过程	余 静(183)
峡江崖洞居遗存与华南早期“洞蛮”聚落人文	佟 珊 吴春明(198)
峡江地区清代城址类型论纲	霍东峰 赵永军(212)
唐宋时期三峡地区移民史迹考察	
——以下颌托为对象	吴小平(226)

沿河县小河口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石制品研究	王新金(232)
全新世早中期环境下的跨湖桥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关系	孙国平(242)
大嘴子遗址和双砣子遗址晚期遗存试析	
——兼论双砣子三期文化遗址材料的分段和年代	赵宾福 丛德新(253)
曾侯昃剑小考	曹锦炎(272)
一件汉代铜灯的初步研究	赵凤燕 李书镇 郭永淇(277)
广西出土的汉代铅钡玻璃研究	熊昭明 李青会(283)
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主试考	叶 植 魏航空(291)
两湖地区隋墓十二辰图像的特质及其影响	王元林(299)
编后记	(312)

关于配合长江三峡水库考古工作情况的汇报

石兴邦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20 世纪 50 年代，正值我国建国伊始，是百废待举的建设时期，作为时代尖兵的文物考古队伍，任务更加艰巨紧迫。当时我们的任务集中在外援 165 项工程的中原地区（西安、洛阳、侯马）、黄河三门峡水库和长江三峡的水利建设工程地区。考古队一方面开展调查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培养人才组建队伍。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划时代的丰硕成果，不负伟大时代的期望。这些工作，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现在就我所知的配合长江流域三峡水利建设工作的情况作一简要的汇报。

一

配合黄河流域的基建工程的考古工作，在 1955 年前后就结束了，之后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重点便向长江流域转移。

1958 年秋，我们在侯马工作站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文物局和科学院考古所领导将配合工作的重心转到长江流域，主要是长江三峡库区和相关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这时组织上派牛兆勋同志来考古所加强领导工作。我便同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秘书谢元璐和牛兆勋副所长一起来到武汉，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长办）的负责同志协商有关长办所管水利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和考古调查发掘研究事宜。

我们来到武汉长办大楼，拜见了长办主任林一山和政治部主任丁福五等负责同志，大家见面说明情况，介绍来意和目的后，都十分高兴。凑巧的是谢元璐同志和林一山主任还是同班同学，这就增加了亲近感。大家谈得热烈，林一山同志是个知识分子，一听我们是文物界保护文化遗产研究古代文化的，特别热情，答应尽力做好配合工作。王书庄先生谈了我们的打算和计划，牛兆勋同志谈了考古的任务和职责，这都与三峡工程密切相关。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成立“三峡地区考古工作队”，实行全流域统一规划，分区负责，协同工作。另外还决定下次会议将邀请全流域的同志在一起共同协商研究工作的计划和办法。

二

（一）为配合长江流域规划工程，于1958年12月1日至3日在武昌召开长江流域文物考古会议，会议决定由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及长江流域各省区文物考古单位（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云南、安徽、青海、江苏、浙江）共同组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该队挂靠在“长办”，为其组成机构的一部分，同时在业务上接受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指导。同时在各有关市区成立分队，由地方领导，在业务上接受总队的指导。会议推选牛兆勋为总队长，王书庄、曹建国、丁福五等为副总队长。总队部下设立办公室，由考古所陈准（所长助理秘书）承担办公事务（后来陈准转为长办编制）。为了加强业务联系，原考古所考古队为长办考古队直属队（对全流域各队负有联络辅导责任）。石兴邦（考古所所务秘书）担任队长，陈准、张云鹏为副队长。

会议由王书庄副局长主持，先后听取了林一山、丁福五、牛兆勋、陈滋德等有关同志的报告和讲话，会中对长江流域文物工作做了充分分析，确定了今后开展工作的方向和方法，拟定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组织规程（草案）》，研究制订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成立会上的工作跃进约定书》，其内容如下：

1. 各省争取今年年底把分队组织起来，立即与其他建设部门取得密切联系，掌握工程的项目、范围和施工的进度，根据得到的资料、图纸及本地区的文物分布情况进行研究，拟出1959年的计划（包括情况分析、科学要求、工作进度、工作方法、发动群众等工作），报送总队。

2. 要层层办训练班，在地方党政领导下，在县、社大办干部和群众的训练班，或采用统一领导下分片分级的包干办法培训。

3. 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区划内的调查、复查工作，争取于短期内调查完毕，并写出调查报告。

4. 政治挂帅，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文物考古工作为政治服务，为建设服务的方针。执行两利方针，在保证不影响工程进行的原则下，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发掘整理工作。要边发掘边整理，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5. 对地上革命遗址和古代建筑区分轻重，选择重点，做好迁移保护工作，对散存民间的历史、革命文物要结合调查迁移工作进行搜集。

6. 大力进行宣传，召开各次会议，印发大量通俗的宣传资料，使工程区内的干部民工人人皆知保护文物的重要性。积极发动骨干分子参加宣传工作，发表宣传性文章，在明年（1959年）“七·一”左右筹开一个全流域性的文物展览会。

7. 各分队在明年“十·一”前要编写：(1) 调查报告1~5份，(2) 发掘报告1~5份，(3) 图录1~5篇，(4) 研究报告1~5份。

8. 大搞技术革新，每一分队，明年至少要进行改革5~10项，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互相协作，支援困难地区，与总队保持密切联系，至少每月撰写通讯报告一份，保证长江流域规划地区的文物考古学术体系构建和统一规划的完成。

(二) 1959年12月21日~27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直属队及沿江10省分队长会议，上海、浙江文物管理部门同志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共计30人，会议由丁福五主任主持。长办第二书记李建序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他指出一年来由于大搞协作，大搞群众运动，取得显著成绩。王书庄副队长作了《一年来文物考古队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夏鼐先生在会上作了《长江流域的考古问题》的发言，其主旨和内容是：1. 长江流域的旧石器文化。2. 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3. 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4. 长江流域各地区古代社会性质。5. 古代长江流域对于中国物质文化的贡献。这五部分都是实际问题，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的启发。

各分队都发了言，王书庄同志作了会议总结，长办林一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三

在这期间，长江考古队曾举办了两次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邀请北大、陕西和湖北的一些学者讲课作报告，培训两百多学员，对沿江各省考古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北京考古所在长江流域的工作开展得较早，解放初期就到长沙进行发掘，后来转到中原地区。1956年秋，王伯洪和张云鹏（由半坡抽调到湖北）到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和天门石家河遗址发掘，标志着湖北地区工作的正式展开，后来金学山、郑笑梅、纪仲庆、杨锡璋、刘勋和邵望平等20余同志，先后在郧县均县及三峡地区进行田野工作，发掘了青龙泉、大寺、朱家台等遗址。

第一次训练班是在湖北郧县考古所工地举行的，参加的多是考古所学员和湖北地方考古队干部，共计三十余人。我和陈淮是从武汉乘小飞机去的，把当地资料作教材，进行培训。

第二次训练班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淮同志请示长办林一山同志，在沿江各省调了180多名考古人员在武汉学习。当时我已回陕西工作，辅员由我从陕西带的魏京武、郭长江、唐全裕等五六位同志及几位地方同志担任，在武汉开学，在红花套遗址实习。这次培训班办得很成功，可说是人才、文物双丰收。

训练班结束后，我和陕西团队顺江而下，考察下江各省文化考古情况，和考古界同

仁讨论建立中国考古学体系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等问题。

也正在这时，湖南长沙挖掘马王堆三号墓，陈滋德同志要我去辅导。因我在下江耽误的时间长，到时已开始发掘了。王冶秋、夏鼐先生都到场指导监督，我后来留在那里协助工作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三号墓发掘完毕，才回到陕西。

四

第一次三峡水利工程会议情况。

这次会议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首先召开动员和报告（有关各方情况）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学术界人士达几百人，包括三峡工程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学者与领导，水文、地质、地理、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以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这次大会是相关综合力量的誓师大会，盛况空前。会议由水利部和长办负责组织召开。

大会首先请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讲话，他对三峡工程特别关心重视。他把三峡建设和时代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街道上到处都贴着“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标语，并就三峡建设征求群众建议。王任重同志指出三峡水利工程建设是跨时代的伟大工程，大家一定要“多快好省”地建起来，他特别提出要“快”，他要求大家能“快些建起来”，提出建设时限，最好在五年以内完成建设工程。

接着，李振南总工程师介绍水坝设计及有关情况。他介绍了世界大型水利工程情况，指出三峡水坝是世界第二高坝，库水容量世界第一。他讲了建成以后的效益，在运输、发电、泄洪等方面的作用，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并重点介绍了坝址选在三斗坪的优势。

第二步，实地考察库区坝址——三斗坪，我们乘坐的是毛主席游三峡乘坐的“江峡轮”，指挥我们去的是水利部副部长，和我们同舱的还有史地学家侯仁之和数学家华罗庚（华罗庚这次来是运用他的优选法于水利工程问题上）。大家在这里勘查了三斗坪坝址（主体工程地址）、黄陵庙（历史上三峡最高水位到黄陵庙的柱子上）、昭君故里香溪及沿岸岩葬等。

这次会议和考察肯定了三峡建坝的科学根据和实际需求。

第二次三峡水坝工程会议情况。

在第一次工作会议后，隔了一段时间（1~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召开了第二次三峡水利工程会议。我们考古界也有人参加，但人数较少，多为专业方向的学者。会议仍由李振南同志作报告。

这次会议介绍了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引起一些同志的关注，特别引起注意的是

喀斯特地质情况，它在三峡地区特别发育，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建设坝址就会受影响。特别是下游的同志多有疑虑，后来就停下来没有多大的进展。

第三次我碰到三峡工程问题，是在七届人大期间。当时我是人大代表，为了解决国家建设中的能源问题，李鹏总理重新提出修建三峡水坝。陕西省省长对我说，国家缺能源，阻碍现代化建设，应该修水坝。投票时，我们投了赞成票，但下江各省投票的人很少，明显不同意。

五

1958年在武汉结束了长办关于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会议后，由于牛兆勋所长刚来，需要了解考古工作情况，我和他商量到广州和四川去考查一下当地文物考古方面的情况。我们决定先去广州看一下南越王墓。这是当时有巨大影响的一个考古发现，能使他对考古及文物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同时可以向广州同志介绍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情况，对指导他们发展有好处。

初冬的北京还有些凉，而到广州时，则像初秋，仍带热意。

我们先找到麦英豪同志，他很热情，给我们拿了一捆刚收割的甘蔗，我们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谈广东的考古情况。由他引导，我们看了南越王墓的遗迹和遗物，游览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等文物史迹。我们将最近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情况向他们介绍了一下，他说希望多和我们联系，有机会到北京和西安参观。

第四天，我们离开广州回到西安研究室后奔赴四川成都，了解四川对三峡工程的举措。

我们一到成都，就去博物馆了解情况，并拜访冯汉骥等先生和其他同志，看他们是如何配合三峡工程工作的。得到的消息令我们很吃惊，他们尚无所作为。我从冯汉骥前辈那里得知，四川省不太重视考古工作，对配合三峡工作不热心，本地又是三线地区，建设工程也少，考古工作开展十分有限，他希望中央同志多来几次做领导同志的工作。从和他的交谈中我得知，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刚成立的时候，梁思永先生曾请他去考古所工作，四川不放他走，说四川也要搞考古，但也没有行动，很有些遗憾。我们在成都待了一个多星期，受到了冯先生的热情款待，至今我仍心存感激。

当时，在尹达、王冶秋两位同志领导下，考古所和文物局合作得很好，文物局的工作，多由考古所的同志完成，大家工作得很愉快。当时文物局王书庄副局长、谢元璐秘书、陈滋德处长，有时还有庄敏，我们常在一起工作。除工作勤恳外，我们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另一原因是生活条件较好：一是出差多住旅社宾馆，无饥饿之难；二是当时京汉路上行旅条件优越。

正因为这次四川成都之行，我们和地方同志结下了友谊，之后他们又邀请我辅导卡诺遗址的发掘工作及以后的一些考古研究工作事宜。

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在三峡工程进行的过程中，四川出了一个《古峡迷雾》的电影剧本。这个剧本先送到郭沫若院长手里，郭老将这个剧本送到考古所审查，我当时是所务秘书，考古所让我看。剧本是童恩正同志写的，描写一批西方学者到三峡以旅游的名义来探察盗窃中国文物和国宝的事情。因缺乏事实背景，想象和编造的内容较多，价值不大，所以没有采用退了回去。后来我和童恩正同志合作共事，期间没有向他提及此事，怕他伤心，他的一片爱国热情还是值得我们称赞和记取的。这些事都是因三峡而发生，写到这里以作纪念，我想也是值得的。

三峡考古的回顾与启示

乔 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三峡本是中国自汉晋以来出现的自然地理概念，是长江在由四川盆地向江汉平原东流过程中截断巫山背斜时所形成的三个主要峡谷的统称。由于当代中国在三峡区域修建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受工程建设和水库蓄水的影响形成了上迄重庆江津下至湖北宜昌、长江干流流程约 660 千米，面积达 1084 平方千米的三峡水库。三峡库区是由于现代工程建设所形成的特殊地理区域，既具有经济地理区域的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行政地理的概念。围绕着工程建设和移民迁建，在这一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使之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地理单元，因此本文三峡考古的空间范围主要就是基于三峡库区的特定地理概念。

一

三峡库区近代的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期，1877 年英国人巴伯 (E. Colborne Baber) 在重庆附近发现石棺一具，并在附近发现有石器，故将石棺的年代与石器联系起来视作较早的遗存^①。1886 年英国人贝巴 (C. E. Baber) 在四川游历时也曾于重庆附近购得磨制石器二枚，这些发现使三峡地区存在早期文化遗存的事实开始为世人所知晓。此后的 20 世纪 20 年代初，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埃德加 (J. Edgar) 也曾于三峡沿岸采集过所谓的旧石器。1925 年 ~ 1926 年间，美国中亚探险队考古学主任纳尔逊 (N. C. Nelson) 调查三峡史前遗迹，主要对洞穴中的古生物和文化遗存进行考察，获得资料十分丰富，其中也包括了诸如大溪、楠木园等重要的史前遗址。此后，抗日战争期间一些退居后方的中国学者也对重庆江北和沙坪坝等地的汉墓等遗存进行过踏勘或清理^②。到 1946 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郑德坤在其所著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中共记录分布在三峡库区所谓的史前遗迹达 35 处，范围自重庆一直到宜昌。此外，还记录了一些汉代的墓葬遗存^③。

新中国成立后，1954 年西南博物院在重庆巴县冬笋坝清理的战国至汉代的船棺葬第一次系统地显现了巴人考古学文化的特殊面貌^④，并与广元昭化宝轮院的发现一道成